中国法院博物馆 一座记录法制进程的宝库

严冰　赵一鸣　王广燕

中国法院博物馆新馆（资料图片）

在北京东交民巷与正义路的交叉口，一栋始建于1910年的西式建筑在绿树的掩映下格外显眼。它就是于今年1月6日正式开放的中国法院博物馆新馆。过去，这里是日本正金银行北京支行的旧址。时光流转，如今，这里已成为记录中国法制进程的一座宝库。

馆内展出的中国“青铜法典”

《钦定大清会典》

法院博物馆工作人员向笔者介绍，自新馆正式向社会公众开放以来，每天都有很多游客来参观。“既有法院工作者、学生，也有老红军、国际友人。”走进博物馆，留言墙上贴满了国内外参观者的感悟。一名来自湖北省随县人民法院的参观者于6月3日留言：“来京第一件事就是参观这里，不虚此行。”

在这里，“法律古籍珍本展”“正义的审判——审判日本战犯”“外国法院及国际法院掠影”等多个专题展厅，以丰富的史料、新颖的技术，呈现出中国与世界厚重而又与时俱进的法制文化。

触控台上显示出大案要案的审判信息

史料丰富，法制文明可追溯

博物馆内，静静陈列着的许多法典古籍、文物器具，向参观者诉说着中国法律制度建设的前世今生。

“这一尊青铜器是用来做什么的呢？”7月7日上午，展厅内的一件文物引来几名参观者驻足，其古朴特别的造型引人遐想。这件西周中期的青铜铸器，内底和盖上共铸铭文157字，记载了中国现存最早的一篇诉讼判决书，有中国“青铜法典”的美誉。

在“法律古籍珍本”展览区，笔者看到，大量明清至中华民国时期的古籍善本摆满了一整面书橱。博物馆现存古籍善本2488册，展出约2000册。这批古籍以法律图书为主，如整套的《明会典》《大清会典》《驳案汇编》等，其中最早的古籍是刊印于明朝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的《明会典》。清光绪年间御制的《钦定大清会典》，不仅是清朝行政法规大全，而且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完备的行政法典。这些古籍和文物反映出的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对参观者认识中国法制的进展弥足珍贵。

“我对法律知识了解得少，但是看到这些文物，对古代律法的感性认识油然而生。”在食品研究所工作的陈先生告诉笔者。

二楼的长廊里，墙上的一条时间线记录了近代中国法制的进程：从1949年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办公，到1956年董必武首次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伴随着参观者的脚步，时间线上的中国法律制度也日臻完善。第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新中国成立初期最高人民法院使用过的国徽、1956年审判日本战犯时的旁听证、审判员专用印章等各个时期的珍贵文物，穿越时光与人们实现了“对话”。

趣味互动，法制教育“活”起来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 ）调查收集。”括号里选项有“可以”“应当”“应当委托律师”。在人机知识问答平台区域，笔者看到，林女士正认真地答着题，一番思考后，她在答题屏幕上按下了“应当”这个选项。随即屏幕上便弹出：“恭喜您答对8道题，获得普法达人称号。”“一共10题，对了8道，我还是很开心的。”林女士兴奋地说，“我觉得这个互动答题的板块特别好，这种知识问答的形式能让人们在游戏中学习法律知识。”

多媒体技术在展区得到了广泛的运用。走进“全面依法治国，走向伟大复兴”展区，便见巨型LED屏幕环绕在展厅上方，展厅中央有一个大型的触屏控制台，上面展示的是近年来较为典型的各类案例，如“薄熙来案”“周永康案”“湄公河劫持中国船只案”等。轻轻一点，该案例的具体内容、审判视频就会呈现在上方的大屏幕上。

“这些案例比较新，书本上还没有涉及，来这里能丰富我的视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学生王泽荣告诉笔者，“这种多媒体的展现形式，能够把复杂的案例变得通俗易懂，让普通群众更容易理解与学习。”

可视化、数字化等形式使博物馆的展览变得更加生动形象，参观者对法院的功能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相应地，公民遵守法律的自觉性也进一步提高。

基地建设，国际交流拓视野

“今天是7月7日，是‘七七事变’79周年纪念日，看了这个视频，我很有感触。”刚刚观看完审判日本战犯专题纪录片的陈先生告诉笔者，“日本侵华战争中，中国伤亡人数超过3500万。这些史料警示我们要牢记过去，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确，中国法院博物馆正通过丰富的藏品和图文影像内容，激发参观者的爱国热情。许多参观者表示，他们在观看展览后，不仅更加了解中国法律制度建设的厚重历史，也更为祖国法治建设的巨大进步而感到自豪。

博物馆也致力于促进国际司法交流。“这是中国法治发展中的一个非常有创意和重大意义的重要举措，至少在德国还没有类似的博物馆。这次参观令人印象深刻，希望进一步加强双方在法律文化上的交流与合作。”今年3月21日，德国联邦最高法院院长林佩阁在参观中国法院博物馆后赞赏道。此外，葡萄牙最高法院院长加斯帕尔、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先生，也都先后参观了博物馆并给予高度评价。

参观游客在互动答题区体验

今年5月，博物馆先后举办了中东欧司法文化专题展和英国司法周暨英国司法文化专题展。这些专题展的展品、图片和说明，都是相关国家最高法院提供的第一手资料。尤其是英国司法文化专题展，英国最高法院院长廖伯嘉勋爵亲自挑选展品、案例用于展览。在中国法院博物馆举办国别司法文化专题展，在中国法院历史上是第一次，对进一步增进中国法院与各国法院和法律组织的相互了解与交往，对深化中外司法交流、促进中外司法系统在司法领域参与全球治理、促进各国司法改革影响深远，在中国司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中国法院博物馆也因此具备了日渐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国际影响。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曾提出：“要把中国法院博物馆建设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法制教育基地、司法文化交流基地和人民司法研究基地。”如今，中国法院博物馆正不断地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亦哭亦笑　亦僧亦道

泪写诗画青云间

——走进八大山人纪念馆

本报记者　陆培法

位于南昌南郊15华里处、梅湖定山桥畔的青云谱，是一座极具江南特色的园林。

走进园内，数百年的古樟树、苦楮树、罗汉松苍干青叶，繁荫广被，覆护着青砖灰瓦白墙红柱的殿宇，显得格外静谧。密叶筛过的天光洒在小径上，明暗闪烁，野趣横生。一弯荷池清澈明净，倒映着茏葱修竹，鱼儿嬉戏，花影摇曳。园外清溪蜿蜒，溪畔农田阡陌纵横，农舍炊烟袅袅，恰似人间仙境。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立于1959年的八大山人纪念馆，就坐落在历史悠久、风景优美的青云谱内。

这是我国第一座古代画家纪念馆。

《个山小像》的缘起

1955年底，刚刚调入江西省博物馆不久的李旦，被下放到奉新县罗塘村垦殖场文化站工作。他听说罗塘村中有一许姓人家，曾收藏大量古代字画，其中一幅是八大山人的《个山小像》，画中题跋表明了个山的身世与思想。此画原藏奉新县奉贤寺内，后被许氏以谷米换去，视为镇宅之宝。土改运动开始后，许氏遭到冲击，这些字画被贱价处理，《个山小像》据说被人带到了北京，入藏故宫博物院。

《个山小像》

李旦得此消息后极为兴奋，暗下决心要找到这幅《个山小像》。1958年，汤显祖纪念会在南昌召开，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前来参会，视察了青云谱道观，得知八大山人曾在此地参道修身，并看到了很多藏于此处的八大山人书画“真迹”。夏衍当即拍板，要将青云谱道观改建为“画家八大山人纪念馆”，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个古代画家纪念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

大议既决，八大山人纪念馆的筹备工作随即启动，对古代字画及八大素有研究的李旦被借调来馆，参与筹备。此时，馆中虽然有几幅八大的作品，但真假莫辨，无一幅可称为代表作。为解决这一问题，上级决定委派李旦前往文化部反映困难，请求调支其他地方的八大藏品。

1959年7月，李旦到京，得到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的支持，获得了数件八大的代表作，故宫博物院也同意将《个山小像》调支给八大山人纪念馆。国庆前夕，八大山人纪念馆正式落成，《个山小像》从此成为馆内永久藏品。

朱耷的悲喜人生

八大山人，姓朱名耷，生于明天启六年（1626年），卒于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为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朱权的九世孙。他幼时天资聪颖，承袭儒学，受过良好的艺术熏陶，过着王孙贵族生活。

甲申之变，清政权建立，使年轻的朱耷承受了国破家亡的沉重打击，他曾剃发为僧，皈依佛门，苦心修炼。后还俗隐于书画，并将儒、释、道思想融入书画艺术中，集遗民、禅师、画家于一身。

青云谱道院是典型南方建筑样式，三进院落，关帝殿、吕祖殿、许祖殿依次渐进。步入关帝殿，八大山人画像《个山小像》（高仿品）迎面而来。这是现存唯一的八大山人生前真实画像，成为研究八大山人生平的重要资料。

这幅《个山小像》不仅展现出八大山人的“身份照”，更通过四首自题诗和友人的三处题跋，明确透露出他明宗室身份，详细叙述了八大山人的人生遭遇和进入佛门的经历。

独步古今的艺术大师

八大山人的名气了不得。清初画坛上有四个很有名的和尚画家：石涛、弘仁、髡残、八大，史称“四大画僧”，八大为四僧之冠。

八大山人以水墨写意画著称，尤擅长花鸟画。其画面构图缜密、意境空阔；其笔墨清脱纯净、淋漓酣畅。他的花鸟画，取物造形，形神兼备，超凡脱俗，浑然天成；他的山水画，笔简意赅，干净利落，宁静纯洁，奇情逸韵，气象高标。他的书法淡墨秃笔，含蓄内敛。

到青云谱八大山人纪念馆参观，许多人多半是稀里糊涂进去，一头雾水出来。他的经历扑朔迷离，他的作品奇特难懂。看他的画，幽深宏远；读他的诗，幽涩古雅；看他的字，好看，有说不出来的意味和韵味，可就是不懂、难懂；他的名字、别号也是一大串：朱耷、个山、雪个、刃庵、传綮、八大山人……令人费解，也稀奇古怪。

穿过典雅古朴的道院旧址，连接着一座现代建筑真迹馆。真迹馆内珍藏着八大山人数十幅作品。八大山人的笔下，鸟有各种人的表情，或惊慌，或孤傲，或沉思，而多为白眼向天。八大山人的山水画多是老树枯枝、残山剩水，往往给人冷寂悲伤之感。

其作品上“八大山人”署名题款，却以四字连缀而成，酷似“哭之”“笑之”。他的画作常使用一种鹤形签押，学者普遍认为是三月十九日的变形，以纪念明崇祯帝的忌日。

人生命运遭遇突变挫折后，八大山人的心态一直“如巨石窒泉，如湿絮之遏火”，无可奈何间便“乃忽狂忽瘖，隐约玩世”。清人邵长蘅曾感叹：“世多知山人，然竟无知山人者。”面对苦难的生活，晚年的八大山人超然世外，心境恬淡平和。画僧石涛致信八大山人：“闻先生七十四五登山如飞，真神仙中人也。”

历经苦难、积淀人生的厚度，成就了八大山人的艺术高度。纪念馆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八大山人的艺术概括起来两个字：“冷”和“逸”。“冷”反映他对生活的态度，“逸”代表他艺术上高山仰止的成就。

八大山人画作

300多年来，八大山人饮誉画坛，清代“扬州八怪”、吴昌硕，近代张大千、齐白石、潘天寿、李苦禅等，莫不对其推崇备至而心追手摹，“影响所及三百年来领袖群伦”。

1985年，八大山人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命名为中国古代十大文化名人之一。

在海外的书画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不说八大山人不雅！”把他与音乐魔鬼贝多芬、绘画魔鬼毕加索相提并论，称之为东方的艺术魔鬼；甚至在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里，建立了八大山人艺术研究中心。

八大山人纪念馆